

第二章 戰略火箭軍的歷史沿革

本章將依循時間順序，敘述戰略火箭軍（the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SMF, SRF or RVSN）成軍的歷史背景與發展過程。1957年，挾著世界上第一個洲際彈道導彈—「史普尼克 I 號」（Sputnik I）試射成功的餘威，赫魯雪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免費宣傳的大好良機，成功地營造出蘇聯的戰略武力技術已大幅度成長甚至超越美國的假象，西方世界開始有人對美國的戰略優勢是否遭遇勁敵感到憂心忡忡。1960年，戰略火箭軍就是在這種虛張聲勢的背景下披掛上陣，雖然倉卒成軍但卻受到赫魯雪夫的高度關注！長期獨尊戰略火箭軍的結果，是蘇聯的陸基核子武力在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時期終於如願超前美國。就著嚇阻戰略而言，因著沒有一方能在第一擊

（First-Strike）階段就擊垮對方，所以兩國在1972年簽訂「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I, SALT I）時已建構「嚇阻均衡」的戰略狀態，只不過這樣的均勢是極不穩定的。過度擴充軍備的代價是蘇聯的經濟被拖垮了，民生物資嚴重缺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偏偏這個時候碰上的對手又是反共最力的美國總統雷根（R. Reagan）。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布列日涅夫執政末期已時不我予，對內對外亟需進行改革並且降低姿態，否則政權勢必崩潰。

戈爾巴秋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上台後在背負著沉重經濟壓力的前提下，他決定自美蘇軍備競賽中全面撤退，不再追求戰略優勢。他撤換了一些前朝大老，並拔擢新人以進行國內改革工作。特別是軍事準則更是全面翻新，聲嘶力竭裁減戰略武器的重要性。

第一節 赫魯雪夫催生戰略火箭軍

本章節旨在簡介戰略火箭軍成軍的特殊時空背景。任何環節諸如：核子武器出現後應運而生的軍事理論、蘇聯火箭技術的突破，以及美蘇兩極對峙的僵局等，都是缺一不可的。少了一項也許戰略火箭軍就不是現在呈現的面貌！

1945年8月6日與9日，美國接連在日本廣島(Hiroshima)與長崎(Nagasaki)投下兩枚核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核子武器的使用改變了戰爭的面貌，戰爭不再侷限於兩方短兵相接的傳統戰(conventional wars)。只要有足夠的載具或是投射器，戰爭的勝負極有可能只取決於按鈕的快慢。當時沒有人可以預測得到，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在廣島投下的核子彈威力，結合納粹德國攻擊倫敦的V-2火箭射程，竟能成爲足以摧毀地球數次的恐怖武器－戰略核子武器。蘇聯在戰略武器這個嶄新而碩大無朋的軍事科技領域中取得可觀成就，也讓其軍事準則產生了決定性的改變。

戰略核三角的定義與引發的軍事準則論戰

戰略火箭軍之所以在蘇聯軍隊中有著崇高地位，關鍵就是該軍種指揮、管轄俄羅斯的陸基戰略武力。依據日本前裁軍會議代表部大使今井隆吉撰文指出，所謂的「戰略核子武器」以載具來區分共有三種，而這三個種類合稱爲「戰略核三角」(nuclear triad)：

- 1 • 「陸基戰略核子武器」。也就是「洲際彈道導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蘇聯軍隊的陸基戰略核子武器，就是由戰略火箭軍來統籌管理。
- 2 • 「海基戰略核子武器」。意指海基的「戰略潛艇彈道導彈」(Submarine 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SLBM)，這個部分的核子武器蘇軍是由海軍管轄。
- 3 • 「空基戰略核子武器」。意指空基「戰略轟炸機」(Heavy Bomber)及其

空中發射的「巡弋飛彈」(ALBM)，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核子武器，該部分蘇軍則是由空軍負責。¹

戰略火箭軍所擁有的洲際彈道導彈，在射程上也有嚴格定義。依據 1972 年 5 月，美蘇簽署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臨時協定附帶之「同意聲明」(Agreements) 的 A 條說明，將其定義為：「在臨時協定中，美蘇雙方共同認知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投射器」(Land-based ICBM launchers)，是裝載戰略彈道導彈 (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s) 之發射工具。其最短射程，超過從美洲大陸東北部邊界至蘇聯西北部邊界之間的距離。」²也就是說，射程低於 5500 公里 (從美國本土東北角至蘇聯西北角之間的最短距離) 的核子武器只能算是「戰術核子武器」或稱「戰區核子武器」，主要用途在中短距離的戰爭地區、戰術打擊。蘇聯軍方就是因為在陸基戰略核子武器的研發上頗有成就，而使得戰略火箭軍享有赫赫威望，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數量上遙遙領先美國的陸基戰略武器，性能上也不惶多讓。

核子武器的出現在蘇聯軍事準則層面激起重大爭論。1953 年史達林死後，蘇聯國內許多派別的戰略思想與軍事理論紛紛出籠，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彼此間的論戰自然也愈演愈烈。在赫魯雪夫當政時期，蘇聯的軍事思想爭論共有四大派別，其主張分別如下：

- 1 • 傳統主義：主張即使是在核子時代，傳統武器與傳統軍事思想依舊不會喪失其價值。代表為羅特米斯特洛夫元帥 (Pavel A. Rotmistrov)。
- 2 • 革新主義：主張在未來戰爭中，核子武器具有關鍵性作用。在未來戰爭裡的戰略目標，將是使用戰略攻擊武力優先摧毀交戰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以及行政潛力，空中和地面作戰將退居其次。此派代表為日後官拜戰略火箭軍總司令 (Commander-in-Chief) 的克利洛夫元帥 (Nikolay I. Krylov)、彭達侖柯中校 (Bondarenko) 和屠希克維奇上校 (Tiushkevich) 等年輕一輩的軍官。
- 3 • 中道主義：對核子武器發展樂觀其成，同時也認為傳統兵力和武器不僅必須存在，而且有必要繼續加以發展。此派代表首推索科洛夫斯基元帥 (Vladimir N. Sokolovsky)。
- 4 • 政治派：認為蘇聯軍事權力的來源，一面依賴共產黨 (the Communist

¹ 今井隆吉，「舊蘇聯的核武器及其善後」，*GAIKO FORUM*，(Japan: Mar 1993): 29-38，引自尹慶耀，*獨立國協研究 以俄羅斯為中心* (台北：幼獅，1995)，pp. 90。

²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reements: Texts and Histories of Negotiation*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1980), pp. 154.

Party) 的領導；另一面則寄託於武裝部隊和蘇聯人民的團結之上。武裝部隊固然是以核子武器為基礎，然而武器還是要由「人」來使用，因此一個完備的蘇聯軍人，對祖國和共產主義的完全效忠以及擁戴是其必備信仰要素。也就是說，不管武器如何演變，負責操作武器的這些「人」一定要忠於蘇聯祖國、忠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要澈底的忠貞。這一派的重鎮是葉比雪夫上將 (Aleksey A. Epishev) 以及希爾亞格中將 (Shelyag)、米羅維多夫上校 (Milovidov) 等人。³

赫魯雪夫篤信革新主義。在政壇上紛擾不休的同時，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政策領域上所謂的「傳統派」(Traditionalists) 與赫魯雪夫及「激進派」(Radicals) 之間也是爭論不休，最後由赫魯雪夫及其擁護者勝出。⁴他有鑑於國際緊張情勢的緩和以及核子與太空科技的日新月異，遂推翻了「平衡發展原則」(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Development)，⁵強調核子武器的重要性遠大於傳統武器，當時的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 (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 也附和赫魯雪夫的看法。

赫魯雪夫時期的軍事準則

赫魯雪夫洞察趨勢，相當重視核子武器的發展，也因而對傳統武器不屑一顧。他贊同部份軍事思想家的主張，認為未來的戰爭必定是全面性、毀滅性的核子戰爭，交戰雙方絕無所謂「勝利者」可言。所以為了因應戰爭型態的遽變，蘇聯的傳統軍事結構也必須隨著轉變。戰術導彈部隊必須取代傳統地面武裝部隊，而軍事作戰的優先目標將是戰略目標，軍事演練成為基本元素。⁶蘇聯一面要避免核戰爆發；另一面卻又要著手發展核武，以提高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言權。此外，他也強調不能忽略任何一個小小的局部戰爭，因為星星之火，足以燎原，⁷一個微不足道的區域衝突隨時有可能升級為全面性戰爭。蘇聯有必要未雨綢繆，為這

³ 尹慶耀，「前蘇聯軍事思想的演變」，*問題與研究* 32, 6, (台北：Jun 1993): 56-7。

⁴ Roman Kolkowicz, "The Military," Gerdon H. Skilling &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46-8.

⁵ N. Galay, "The Soviet Approach to the Modern Military Revolution," John Erikson, ed., *Military-Technical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66), pp. 22.

⁶ H. S. Dinerstein, *Soviet Strategic Ideas: January 1960* (Santa Monica: RAND, 1960), pp. 25.

⁷ 1960年7月8日，赫魯雪夫在維也納回答記者發問時發表。尹慶耀，「前蘇聯軍事思想的演變」，*問題與研究* 32, 6, (台北：Jun 1993): 57。

新型態的未來戰爭預先做準備。根據大陸學者陳之驊主編的「蘇聯史綱」一書，將赫魯雪夫時期軍事準則的轉變區分為三個階段：

- 1 • 1953-1956 年，逐漸認知交戰雙方在核子戰爭裡，將會導致共同毀滅的基本特質，並且對這種特質的認知成爲「戰爭不再是不可避免」的重要依據。
- 2 • 1957-1962 年，標示蘇聯在核子時代新的軍事戰略業已成型，認爲未來戰爭必定是以核子戰爭的形式進行，在戰爭初期就已具有決定性，不再像傳統戰那樣曠日費時。
- 3 • 1962-1964 年，新的軍事準則中，特別強調保持軍事技術和軍事力量雙重優勢的重要性。⁸

戰略火箭軍在裁併前的最後一任總司令雅可福列夫（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於 1997 年，主張二次大戰美國壟斷核子武器的現實，迫使蘇聯必須隨之改變軍事準則。也就是說，蘇聯官方是以嚇阻戰略以及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做發展戰略武器的考量。他說道：

為了消除美國在核子武器上的壟斷地位，以及因著戰略武器優勢的庇護，導致地緣政治上蘇聯無法接近甚至威脅美國領土的軍事現實，蘇聯政府有必要採取一切堅決且急迫的措施去製造核子武器和火箭。這是個決定國家存亡的重要問題！「衛國戰爭」(the Great Patriotic War)後僅僅一年的光陰，蘇聯馬上又面臨另外一個戰爭威脅，那將可能是一場全新的、更可怕的戰爭。⁹

在赫魯雪夫的積極鼓勵下，此時蘇聯的軍事準則完全顛覆傳統，呈現全新的風貌。如此徹頭徹尾的轉變也得到蘇聯「部長會議」(the USSR Council of Ministers) 充分支持，軍事準則的調整主要表現在政治與軍事兩個層面：

- 1 • 政治部分。核子武器的出現和發展根本上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性質。
- 2 • 戰爭並不像史達林時期所相信的「戰爭不可避免」，¹⁰然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新的世界大戰倘若爆發，將會是相對立兩大社會體系間決定性的武裝衝突。
- 3 • 未來戰爭具備全世界多數國家都將參與的世界大戰性質，任何區域衝突都將迅速蔓延爲世界大戰，因此否定了局部戰爭的可能性。
- 4 • 未來的世界大戰將必然會是一場核子戰爭，它的特點就是武器的破壞力

⁸ 陳之驊，*蘇聯史綱 (1953-1964)* (北京：人民，1996)，pp. 275-6。

⁹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¹⁰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06-7.

巨大，人員的傷亡慘重，戰爭的空間規模也無限擴大，帶給人類世界無法估計的災難及痛苦。

- 5• 蘇聯支持世界各國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保衛自由成果而進行的正義戰爭。
- 6• 軍事部分。作戰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未來戰爭中作戰方式就是核子導彈突擊、陸地戰場的軍事行動、海洋戰場的軍事行動以及保衛國家後方和軍隊免於遭受敵方核子飛彈突擊這四種軍事行動類型的總合，重點是戰略進攻、先發制人，依靠核武奇襲式行動，力圖在戰爭初期速戰速決。
- 7• 在軍隊建設上，強調「核子武器將首先決定軍隊發展和建設的方向」，主張優先發展核子武器及戰略火箭軍，竭力奪取對敵方的核子飛彈優勢，傳統武力所能發揮的作用將降至最低。¹¹

1969年8月，戰略火箭軍總司令克利洛夫就曾聲嘶力竭地指責蘇聯要提防帝國主義者本質的危險性；而拉格維斯基少將（Gen A. Lagovskiy）隨後也表示，將來蘇聯的武器發展必須隨著對敵人能力之評估有所調整！¹²可以見得核子武器的出現，確實深深影響了蘇聯的戰略思考。面臨美國的軍事科技優勢他們打算要急起直追！

戰略火箭軍緣起於特殊的時空背景

其實，論及戰略火箭軍的緣起，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有鑒於美國在戰爭中使用核子武器所展現的毀滅性殺傷力，1946年5月13日，蘇聯當局就通過法令，打算有計畫地發展火箭武器，建構發展長射程火箭武器相關工業的科學研究機構以及研發部門的完整網絡，有學者認為這項法案目的就是要成立現代的戰略火箭軍：一支不會參與實際戰爭行動，然而本身存在著就可以維持和平的部隊。¹³這項法令為「戰略火箭軍」的發展寫下序章，該年蘇聯為特別目的設置的「最高司令部」（Supreme High Command Reserve, RVGK）正式成立。¹⁴在蘇聯的科學家以及研發人員的同心戮力下，終於達到了軍事科學上的傑出成就！

¹¹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蘇聯軍事基本情況*（北京：軍事科學，1999），pp. 15-6。

¹² Edward L. Warner III,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8), pp. 236.

¹³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¹⁴ "Strategic Missile Troop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 <http://www.fas.org/nuke/guide/russia/agency/rvsn.htm>.

1946 年相關的研發費用比起前年增長了 1.4 倍，不但創立許多新的研究機構，也設置火箭、原子、遙控及電子等領域的新興工業部門。¹⁵

1946 年底，代號「Φ-1」的第一座原子反應爐開始運轉，接下來 1948 年代號「南瓜」的原子彈產製工作也跟著展開。1949 年 8 月 29 日，蘇聯終於試爆核子彈成功。1952 年美國試爆氫彈成功，隔年 8 月 20 日，蘇聯宣布氫彈試爆成功，1957 年史上第一枚彈道導彈試射成功，震撼全世界。¹⁶當年 8 月 26 日蘇聯「塔斯社」(TASS) 率先宣布一枚長程多節洲際彈道導彈發射成功，隨後又在 10 月 4 日，於哈薩克的杜拉塔姆山 (the Tyuratam Range in Kazakhstan)，以「SS-6 型」彈道導彈攜帶人類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 I 號」(俄文原意為「旅伴」) 成功射入太空軌道航行。¹⁷而在最高司令部的部分，1947 年 10 月 18 日，「A-4 型」彈道導彈首次試射成功。¹⁸之所以會有這等傲人成果，由庫洽托夫 (I. V. Kurchatov)、卡里登 (Yu. B. Khariton)、克羅列夫 (S. P. Korolev) 所率領的集體工廠與其他蘇聯核彈科學家居功厥偉，他們卯足心力換來科技上的卓越表現。美蘇兩國在軍備競賽上開始呈現拉鋸戰。¹⁹

對外政策上，1956 年 2 月 14 日，赫魯雪夫樹立「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 的旗幟，並且重新詮釋之：

堅定不移地奉行列寧主義之關於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實行和平共處的政策。積極致力於和平事業，努力爭取各國人民安全，爭取建立國際信任，以便把目前已經獲得的國際緊張局勢之緩和轉變為穩定的和平。²⁰

然而另一方面，卻又與美國積極展開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高科技競賽。蘇

¹⁵ 顧德欣、牛永軍，*核幽靈的震盪—二十世紀核問題回顧與思考* (北京：國防大學，1999)，pp. 51-2。

¹⁶ 殷雄、黃雪梅，*世紀回眸：世界原子彈風雲錄* (北京：新華，1999)，pp. 210-9。

¹⁷ Arnold L. Horelick and Myron Rush, *Strategic Power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p. 42.

¹⁸ “Strategic Missile Troop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 <http://www.fas.org/nuke/guide/russia/agency/rvsn.htm>.

¹⁹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²⁰ 「和平共存」的對外政策，係赫魯雪夫於 1956 年 2 月 14 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議程中所提出，延續列寧、史達林「和平共存」政策之蘇聯對外關係總路線，主張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應實施和平共處的對外政策。請參考：*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重要報告及決議彙編* (台北：陽明山莊，1956)，pp. 39-50。

聯趁勝追擊，到 1961 年 2 月 12 日為止，蘇聯先後共發射了 11 枚人造衛星。赫魯雪夫自然不會放過此時的優勢，1960 年 7 月，派遣時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葛列蚩科（A. A. Grechko）出任華沙公約的聯軍總司令。除了加強華約組織的嚴謹性；並且提供東歐各國新式武器，由蘇聯自力擔任戰略核武的嚇阻任務，把東歐置於其核子傘保護下，企圖將東歐各國的自主可能降至最低，²¹藉此鞏固蘇聯的勢力範圍。

一群核子武器研發人員與導彈操作員，在 1940 年代末及 1950 年代初家園遭受戰爭無情摧殘的嚴苛環境下，默默付出，終於在 1950 年代末期成功促使這支新軍種的建立。幾乎就在史普尼克 I 號成功發射後兩年，1959 年 12 月 17 日，部長會議簽署一項「關於賦予戰略火箭軍總司令在蘇聯武裝部隊中地位」（On Founding the Position of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Missile For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的法令，並於同一天創立「戰略火箭軍」，首任「代理」總司令為尼捷令（M. I. Nedelin）。而從 1955 年開始，蘇聯官方就年年大肆慶祝所謂的「戰略火箭軍紀念日」，一如其他的國定假日。

1959 年 12 月 31 日，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簽署一項命令，正式確立戰略火箭軍的編制，該軍種總司令所擁有的單位與組織架構。戰略火箭軍的編制基礎建立於最高司令部旗下的第一火箭部隊、試射場、軍火庫、科學研究機構、所有火箭部隊的指揮總部以及其他的相關控制機關等等，隸屬於戰略火箭軍代理總司令尼捷令麾下。身為該軍種首任總司令的尼捷令曾參與衛國戰爭，戰功彪炳。並且在戰後 14 年，持續不斷地從事核子武器的研發工作，也因而備受赫魯雪夫器重。²²

戰略火箭軍的編制

1959 年進一步改組為獨立「軍種」，1960 年 1 月編制完成的戰略火箭軍受到

²¹ 尹慶耀，「華沙條約組織的量變與質變」，*問題與研究* 8, 8, (台北：May 1969): 43。

²²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強調新戰略思想的赫魯雪夫青睞，甫自成立即刻躍居所有軍種之首，成為「最高司令部」(Supreme High Commands)的主幹。²³赫魯雪夫在權位大勢底定的同時重新調整國防組織結構，裁減兵力 120 萬人。1961 年 1 月 14 日與 19 日，赫魯雪夫趕著戰略火箭軍創建伊始打鐵趁熱，夥同馬林諾夫斯基共同宣布蘇聯的新軍事準則。繼蘇共廿二大之後，赫魯雪夫再度強調，核子武器已經徹底改變了戰爭的本質，只有依靠核子武器以及導彈方能克敵制勝。未來的戰爭將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毀滅性核子大戰，而核子武器將是蘇聯未來抵禦外敵、保護國土的最主要方式，其他軍種部隊必須支援核子部隊進行作戰。²⁴未來的戰爭將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對決的全面性大戰，不可能會是有限的武裝衝突。馬林諾夫斯基更直接預言未來的戰爭型態：

如果帝國主義發動戰爭，那麼將會是對社會主義的一場毀滅戰，而且無疑地將是一場核子大戰。所有戰略目標將會被火箭摧毀，戰爭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明顯的預警期，轉而是以長程核子導彈發起戰爭。²⁵

在馬林諾夫斯基的積極推展下，戰略火箭軍的編制總算有了初步的規模，由上到下包括了四個層級。日後該軍種的幾位總司令都是經過這些層級的歷練，一路扶搖直上，例如謝爾蓋耶夫(Igor D. Sergeyev)與雅可福列夫。四個層級如下：

- 1 • 「火箭集團軍」(the missile army)。火箭集團軍是戰略火箭軍的戰略軍團，下轄 3 至 7 個火箭師。草創之初只有 4 個火箭集團軍。
- 2 • 「火箭師」(the missile division)。屬於戰術兵團，下轄 1 至 9 個火箭團。通常一個火箭師的兵力約為 7000 至 8000 人左右，草創時約有 12 至 21 個火箭團。任務是對下轄火箭團提供技術支援。值得注意的是，師長轄管一個團級的技術基地，該基地編有 3000 至 4000 人，由一名上校指揮。技術基地負責為火箭團的導彈提供運輸、保養、補給以及勤務支援。
- 3 • 「火箭團」(the missile regiment)。是基本戰術部隊單位，其下有若干火箭發射營。根據所裝備的導彈類型不同，作戰兵力約為 250 至 400 人不等。職司保養和防衛導彈，以及發射導彈。身為蘇軍中最小的團級單位，一個火箭團編有團長、參謀人員、5 個值班發射組、1 個緊急修理連與 1 個警衛連。每個火箭團都各有一個地下指揮所和在車輛上執行勤務的機動控制所，可依情況緊急程度進行最妥善安排，兩個小組皆有權下令發射導彈。

²³ V. D. Sokolovsky, et al., eds., *Military Strategy: Soviet Doctrine and Concepts* (New York: Praeger, 1963), pp. 225.

²⁴ H. F. Scott and W. F. Scot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 (Boulder: Westview, 1978), pp. 44-5.

²⁵ H. F. Scott and W. F. Scot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 (Boulder: Westview, 1978), pp. 45.

- 4 • 「火箭發射營」(the launch team)。發射營是基本的發射分隊，又分爲 3 個發射連，每連負責一個火箭發射地窖或火箭發射架。²⁶

蘇聯軍方快速地（甚至可以說有點倉卒）設立戰略火箭軍，舉凡設置軍事設施、兵員編制乃至於武器生產無一不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而負責訓練戰略火箭軍指揮人才的培訓機構隨之即刻成立，所有單位與次單位的士兵也馬上接受高度專業化的訓練。警報系統、動員程序、使用核子武器的命令以及指揮體系更是迅速制度化。爲的就是希望該軍種憑藉著陸基洲際彈道導彈以及中程彈道導彈（Intermediate Range Missiles, IRBM）的廣大射程，得以保衛蘇聯遼闊的領土不受外來侵略。²⁷甫一成軍就受到蘇聯領導高層如此重視，就是著眼於假戰略武器的攻擊力與射程虛張聲勢，採取以最少投資、獲致最高效益的戰略，企圖造成對手美國的恐慌與讓步。戰略火箭軍儼然就是推動國際戰略優勢朝蘇聯傾斜的新秘密武器。

懦夫遊戲：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

1962 年 7 月初，古巴國防部長保羅·卡斯楚（Paul Castro）造訪莫斯科，討論古巴與蘇聯結成新軍事聯盟的事宜。在談判結束後，赫魯雪夫決定將彈道導彈分批運往古巴。首先運送的是防衛性武器，特別是當時首屈一指的「SA-2 型」導彈將打頭陣。攻擊性武器以「SS-4」、「SS-5」這兩型導彈爲主（蘇軍編制內的型號則爲 R-12、R-14），則是第二批預定抵達的武器。²⁸這次的彈道導彈運送計畫美其名是防止美國帝國主義入侵古巴，而蘇聯官方也普遍認爲先前成立的戰略火箭軍對於這項計畫有著實質幫助。於是乎，以 42 枚 R-12 以及 R-14 型中程彈道導彈所組成的一個部隊單位，在美軍重重封鎖下航向古巴。戰略火箭軍在這支部隊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丹柯維芝(P. B. Dankevich)中將、阿金迪諾夫(P.

²⁶ 譚文革、王美華、李亞華，*絕望中奮起的戰神 俄羅斯軍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1999），pp. 147、163-4。

²⁷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²⁸ Timothy Naftali, "Cuban Missile Crisis Highlights: Origin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millercenter.virginia.edu/pubs/kremlin/kremlin_origins.pdf.

V. Akindinov) 中將以及嘉巴茲(L. S. Garbuz) 少將均位居要職，史達參科(I. D. Statsenko) 少將更是有權直接指揮駐紮古巴的戰略火箭軍。²⁹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發生前後，第二任戰略火箭軍總司令摩斯卡連科 (K. S. Moskalenko)、駐東德部隊總司令科涅夫、參謀總長札哈洛夫 (M. V. Zakharov) 與總政治部主任加利科夫 (F. I. Golikov) 則是因為反對赫魯雪夫的在古巴的冒進行為而慘遭革職，³⁰日後 1968 年爆發捷克自由化運動時，戰略火箭軍總司令克利洛夫也曾表示反對干涉的意見，卻被壓制下來。蘇聯以「國家安全委員會」(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 KGB) 滲透軍方進行政治偵防工作，加強對軍方的嚴密監控，果然讓蘇聯的武裝力量完全服從於領導人的統馭。

10 月 18 日，蘇聯選擇在這場經典「懦夫遊戲」(chicken game) 中選擇退卻。赫魯雪夫致函甘迺迪表示，古巴境內的飛彈將撤回蘇聯，並且停止飛彈基地的建造工事。³¹美國贏了面子，也給蘇聯贏了裡子，1962 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產生了三個結果。一是 1963 年 7 月 25 日，在莫斯科所簽署的「局部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由蘇方赫魯雪夫與外交部長葛羅米柯 (A. A. Gromyko)、美國代表哈里曼 (W. Averell Harriman) 以及英國代表海爾謝姆 (Viscount Hailsham) 共同締結。其要點如下：凡簽字國擁有核子武器，同意禁止在大氣層、外太空與水面下從事核子試爆；但是條約卻未明確規範關於核子戰爭的威脅、儲存和生產核子武器，以及在「地面下」進行核子試爆等方面。³²其次，是蘇聯不費一兵一卒就獲得美國保證不攻擊古巴以及撤出駐土耳其飛彈的承諾，還藉此與美國修補外交關係。最後則是這樣的退卻，刺激了蘇聯積極投入陸基洲際彈道導彈與潛射彈道導彈的研發，並取得可觀成果。我們可以說，古巴飛彈危機等於是向世人正式宣告，美蘇核武對峙僵局業已成形，蘇聯是當今世上唯一能威脅到美國安全的核子強權。

²⁹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³⁰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引自蔡昇輝，「軍事」，畢英賢主編，*蘇聯* (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pp. 513-4。

³¹ Arthur M. Schlesinger ed.,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 pp. 620.

³² James H. McBride, *The Test Ban Treat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7), pp. 21-2.

第二節 戰略火箭軍的迅速發展與強化

本章節旨在闡述戰略火箭軍在赫魯雪夫以及布列日涅夫任內的研發成果。由於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時空背景，蘇聯的兩任領導人赫魯雪夫與布列日涅夫深信，戰略核子武器就是嚇阻西方國家進犯、維護蘇聯國家安全以及利益的必勝關鍵。所以不斷追加投資戰略武器的研發、生產工作，以為能藉此尋找並且佔據國際戰略佈局的戰略制高點，甚至是取得絕對優勢。不過這麼一來，勢必挹注大量的經濟資源於其中，發展費用遠遠超出國家經濟所能胃納，並且與美國形成軍備競賽，最後耗盡官廩，經濟幾近崩潰邊緣！

草創之初規模有限

戰略火箭軍在草創之初只有區區 4 個集團軍，裝備「8-Ж-38」型火箭（該型火箭係仿造納粹德國著名的 V-2 火箭），以及 1 個火箭靶場。戰略火箭軍的編制在與美國同時期相比下，可說是標準的「虛張聲勢」。根據大陸學者的說法，美國軍隊一般是將 50 枚洲際彈道導彈編為一個中隊，但是同樣的數量蘇聯至少可以編成 5 個團；另外，美國並沒有把旗下的所有核子武器分割出來成立新的軍種，所有的導彈部隊不過是美國空軍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單位之一，而在蘇聯只要 1500 枚導彈就可以成為一支完整的軍種，與陸海空軍平起平坐，其編制之浮誇可見一般。戰略火箭軍的使命是執行戰略任務。作戰時可選擇單獨或與分散在其他軍種的戰略核武力量協同進行任務。該軍種除了有各固定作戰基地以及負責移動基地的部隊（基本單位是導彈發射營）之外，還有一些專業兵員，包括維修兵、工程兵、三防兵、通信兵和無線電電子兵等，此外還有專職後勤補給、測量、氣象、警衛、偵察以及特種航空兵部隊與分隊。³³

³³ 譚文革、王美華、李亞華，*絕望中奮起的戰神 俄羅斯軍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1999），pp.

布列日涅夫時期的軍事準則

1960 年到 1965 年可以稱為戰略火箭軍發展歷史的第一階段。在這些年間，戰略火箭軍的導彈操作員們胼手胝足，面對全新的武器系統展現出無比的熱情與責任感。他們在蘇聯各地配置分支單位、發射基地與兵員，以供攻擊預警系統之用。即使是在許多地理條件惡劣的地區，例如北極地帶、南方地區、針葉林帶、烏拉區（Urals）的乾草原、西伯利亞（Siberia）以及遠東（the Far East）地區，這批猶如拓荒者般的導彈操作員們都一一克服了技術上的困難。他們的努力換來了 1965 年，R-7、R-12、R-14、R-16 以及 R-9 等洲際彈道導彈與中程彈道導彈，³⁴能部署在「陸基隱藏式導彈發射地窖」（land-based silo launchers）。這是技術層面上的一大里程碑，也為戰略火箭軍在作戰時增加許多戰術優勢。而這些隱藏式導彈發射地窖則是克羅列夫、楊格爾（M. K. Yangel）所率領的研發部門精心改良下的具體成果。³⁵

1964 年，赫魯雪夫蘇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位遭解除之後，對外政策、軍事準則也立刻隨之翻修。1968 年蘇聯出兵鎮壓捷克「布拉格之春」自由化運動，並且在歐洲部署新型中程導彈，毫無疑問地，此時蘇聯給予世人的印象相當負面。1971 年第 24 屆黨代表大會，蘇聯執政當局設法對蘇聯的對外政策作法與實踐路線進行修正，以改善蘇聯政權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國際間又是一陣「低蕩」（Detente）和風吹過。此時蘇聯當局通過了「和平計畫」（Peace Program），計畫中提出了一項最具象徵意義的建議，即蘇聯應設法降低核戰爆發的危險。³⁶

但是國家安全政策領域上，則又再次頌讚核子武器的重要性。「蘇聯國防會議」（the Defense Council of the USSR）裏，主要成員放眼望去盡為保守份子：總書記布列日涅夫、狄洪諾夫（N. A. Tikhonov）、前任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 N. Kosygin）、國安會主席安德洛波夫（Yu. V. Andropov）、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基里

126、163、166。

³⁴ 這是蘇聯軍方為自己的導彈所編列的型號，但是北約組織以及西方國家的研究機構則習慣以 SS 開頭的型號來稱呼之。例如 R-12 型導彈，北約名為 SS-4；R-14 型導彈，北約則稱之 SS-5。

³⁵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³⁶ 戈巴契夫著，譚天譯，*俄羅斯的教訓*（台北：貓頭鷹，2001），pp. 251。

連科 (A. P. Chernenko)、蘇斯洛夫 (M. A. Suslov) 以及契爾年柯 (K. U. Chernenko)、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包戈尼 (K. V. Podgorny) 等人。³⁷此時蘇聯軍事準則的發展，主體上延續了 1950 年代的諸多觀念：閃電戰與先發制人。然而適逢兩位領導人的交接，軍事準則還是呈現出細部的差異。布列日涅夫與赫魯雪夫的主張不同處，在於未來的軍事衝突不一定是美蘇間全面性、「啓示錄式」的核武大戰，而很可能是核子武器和傳統武器並用，全球戰爭和區域戰爭同時爆發的型態。1966 年 9 月，蘇聯國防部長葛列蚩科在全軍人會議上發表：

戰爭必須在蘇聯擁有充足合理核子武力的戰略火箭軍，以及優勢的傳統武力之下才能克敵制勝。³⁸

整體而言，布列日涅夫在對外與國防上沿襲傳統採取兩手策略。一面，他高揚「和平共存」的外交旗幟，不斷與美國展開限武談判；另一面，他又不停發展戰略武器。可以說是打著限武旗幟反限武，戰略火箭軍繼續成爲蘇聯軍方的建設中心。1971 年，國防部長葛列蚩科就在「保衛和平與建設共產主義」一文中又高聲讚揚戰略火箭軍的重要性：

戰略火箭軍，是構成蘇聯軍事力量的主幹。其目的乃是在消滅敵方核武攻擊工具，其部隊和軍事基地；並摧毀其軍事工業，擾亂侵略者之政治、軍事行政和交通、後勤。³⁹

蘇聯在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內，埋首研發尖端戰略核武。到 1965 年有了初步成果，戰略火箭軍研發成功「隱藏式導彈發射地窖」，並且將之廣泛設置。在這個成形階段裏戰略火箭軍了完成自己的編制，不論是指揮、動員、研發、核彈按鈕權還是預算分配都有明確的制度規範，兵員訓練與配備武器也達到了初步規模，可以說開始有了蘇聯第一軍種的樣子。而這都要歸功於戰略火箭軍在這段期間的前後四任總司令：尼捷令、摩斯卡連科、比由佐夫 (S. S. Biryuzov) 以及克利洛夫等人的勞心勞力。這四個人的軍階都是元帥，也都是「衛國戰爭」裏擊退

³⁷ 蔡昇輝，「軍事」，畢英賢主編，*蘇聯* (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pp. 501-2.

³⁸ H. F. Scott,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 Its Continuity, 1960-1970* (Westport: Hyperion Press, 1981), pp. 78.

³⁹ Richard Pipes, "Why the Soviet Union Thinks It Could Fight and Win a Nuclear War," *Commentary* 1 (New York: Jul 1977): 33.

納粹敵寇、名揚四海的戰爭英雄。有他們的竭力奉獻，戰略火箭軍才逐步建立起在蘇聯武裝部隊中的威望。⁴⁰

發展的第二階段：1966 年至 1972 年，美蘇簽訂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布列日涅夫的兩手策略十分成功，不但戰略火箭軍迅速成長茁壯順利地抵達他所計畫的戰略位置；對外政策上和平共存的號角也得到了美方的回應。1972 年 5 月 22 日，美國總統尼克森飛抵莫斯科與布列日涅夫會晤，並且一口氣簽署了「美蘇關於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簡稱「反彈道導彈條約」，1972 年 10 月 3 日生效）、「美蘇關係基本原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以下簡稱 SALT I）等協定。SALT I 算是人類進入核子時代後，限武談判上的第一個里程碑，因為該約無異正式承認美蘇在戰略武力對比（correlation of forces）上已達成「嚇阻均衡」（Deterrence equilibrium）的戰略狀態，或稱作「戰略均衡」（Strategic Parity）。⁴¹我們可以說從 1966 年到 1972 年，是戰略火箭軍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最重要的發展是美蘇簽訂了 SALT I。

三項條約中規定美蘇雙方只能各自部署兩座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一座防衛首都，另一座防衛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基地，且兩者不能串聯成一防禦網。同時禁止發展、試驗、生產及部署在海底、空中、太空或是陸上機動運輸工具上（獨獨沒有「地底下」一項）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此規定永久有效。⁴²且具體約束雙方的核武數目：美國可以擁有 1054 枚陸基洲際彈道導彈；蘇聯則有 1607 枚。美國可以擁有 44 艘核子潛艇，710 枚潛射彈道導彈；蘇聯可以擁有 62 艘核子潛艇，950 枚潛射彈道導彈。⁴³不過，條約當中僅限制雙方戰略核武「發射器數量」，對於戰略核武的「質」則未加以規範、干預，故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而短暫

⁴⁰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⁴¹ 畢英賢，「外交」，畢英賢主編，*蘇聯*（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pp. 336-7, and Myron Rush, "The War Danger in Soviet Policy and Propaganda," *Comparative Strategy* 8, 1, (New York: Spring 1989): 4.

⁴² 可惜最後美國仍然片面撕毀這項舉世聞名的反彈道導彈條約。 *The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pecial Report 4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79), pp. 4.

⁴³ *The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pecial Report 4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79), pp. 4.

的嚇阻均衡局勢也隨時可能翻盤。爾後美蘇各憑本事研發、改良，造成了核子武力領域美國在「質」的方面略勝一籌，蘇聯則在「量」方面享有優勢的狀態，雙方實力暫時旗鼓相當。⁴⁴至於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工作，隨後也因經濟上蘇聯需要西方陣營的科技與資本支援；美國則有國會不得不削減武器預算的壓力，⁴⁵雙方一拍即合，順利坐上談判桌！

發展的第三階段：1973 年至 1985 年，發展第三代洲際彈道導彈

從 1973 年至戈爾巴秋夫上台的 1985 年，是戰略火箭軍在技術上發展最迅速的第三階段。針對美國的攻擊性武器不停增強其攻擊能力，蘇聯也陸續加碼投資。除了發射器的改良，導彈科技也是日新月異。首先由契洛梅（V. N. Chelomey）與尤金（V. F. Utkin）兩人主導研發工作，且成功發展新型的「第三代洲際彈道導彈系統」：「RS-16」、「RS-18」、「RS-20」，北約組織命名為「SS-17」、「SS-19」（野人式 Savage）、「SS-18」（撒旦式 Satan）型（以下統稱為 SS-17、SS-19、SS-18）在此時問世。新世代的彈道導彈配備了稱為「多彈頭獨立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s）的新設備。⁴⁶且於 1975 年進行部署工作，具有相同技術的潛射彈道飛彈「SS-N-18 Jr.型」亦於 1978 年末期部署完成。

除了第三代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研發成功之外，戰略火箭軍的發射器數與彈頭數也在 1970 年代後期明顯增加（請參考表 2-1），彈頭數從 1975 年的 3000 個，增至 1980 年底時 7000 個左右，同時彈頭的投射技術也有著大幅改善。在 1980 年中期，SS-19 因導引系統的精進，而使得其圓形公算偏差降為 850 呎，SS-17 也降為 1640 呎不等。而 1977 年 9 月首次的原型飛行試驗，提供 SS-18 與 SS-19 所使用的全新導引系統，更是進化到圓形公算偏差僅 600 呎的目標。1978 年 SS-18 的誤差半徑（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已精進到與美國陸基彈道導彈並駕齊

⁴⁴ Gerhard Wettig, "Dimensions of Soviet Arms Control Policy," *Comparative Strategy* 7, 1, (New York: Spring 1988): 1-15.

⁴⁵ Seyom Brown, *The Faces of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26.

⁴⁶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sov137_s97017.htm.

驅，縮小到 0.1 哩以內。⁴⁷最後，蘇聯在戰略指揮管制通訊系統上的研發腳步更是疾行猛進，不但保護政府領導階層的能力有相對上的提升，許多通訊系統的生存能力也隨之改善。⁴⁸

表 2-1：美蘇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成長比較表（1959-1981）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蘇聯	少許	不到 50	50	75	100	200	270	300
美國	無	12	63	294	424	834	854	904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蘇聯	460	800	1050	1300	1527	1527	1575	1618
美國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蘇聯	1527	1477	1350	1400	1398	1398	1398	
美國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2	

註：1974 年 11 月，美蘇在海參崴高峰會議中達成一項協議，雙方的發射器最高限額為 2400 具（包括戰略轟炸機在內），以及 1320 具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載具。因此，1975 年蘇聯將舊式單彈頭的 SS-7 及 SS-8 型導彈發射系統開始拆除，到了 1978 年已拆除完畢。

資料來源：金家鎮，「蘇聯的戰略武力」，《問題與研究》22, 1, (台北：Oct 1982): 62。

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向來就有速度快、打擊準確的優點。在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戰略火箭軍可以說是陣容整齊，也是相對上國際戰略優勢最向蘇聯傾斜的時刻。該軍種旗下陸基洲際彈道導彈的投擲重量與彈頭數目高達蘇聯所有核子武器的 80% 以上，蘇聯戰略核三角的主力地位當之無愧。特別是 1976 年 3 月開始發展的「RSD-10 型」（以下簡稱為 SS-20）中長程彈道導彈（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⁴⁹射程高達 3000 英哩，且可攜帶 3 枚彈頭，對西歐諸國及日本造成極大威脅。

1979 年 6 月，布列日涅夫和美國總統卡特（J. Carter）終於在維也納簽訂「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II，以下簡稱 SALT II）。其條約要點規定：美蘇雙方可以各自擁有 2400 枚核彈頭，但是其中只能有 1320 枚具備多彈頭單獨目標設定的導彈。雙方不得增加「重型飛彈」數量。雙方得各自利用「當事國科技手段」（national technical means）查驗對方條約的履

⁴⁷ Michael Donley ed., *SALT Handbook* (Washington D.C.: Heritage Foundation, 1979), pp. 77-8.

⁴⁸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編，程竑譯，1980—1981 世界各國戰略透視（台北：黎明文化，1982），pp. 26-7。

⁴⁹ “RT-21M / SS-20 SABER,” Global security 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russia/rt-21m.htm>.

行。不得試驗或部署「反衛星彈道導彈」(Anti-Satellite Ballistic Missile, ASBM)。⁵⁰可惜條約締結後，雙方各懷鬼胎、互不信任，SALT II 也就跟著無疾而終。

蘇聯的陸基戰略武力已凌駕美國，執世界牛耳

當時戰略火箭軍的實力已獨步全球，執世界牛耳，各型彈道導彈都有獨當一面的實力。首先，在第三代陸基洲際彈道導彈中 SS-18 是蘇聯最大型的飛彈，曾讓西歐國家寢食難安。若無 SALT II 的束縛，可以攜帶至少 26 枚彈頭。⁵¹其次，早在 1965 年就部署的 SS-9 數量已近 200 枚，其爆炸力高達 2500 萬噸黃色炸藥 (TNT)。蘇聯在重型飛彈上獨步全球的數量優勢 (quantitative superiority) 令美國感到如芒刺在背，一般軍事學者認為當時蘇聯的重型飛彈約有 308 枚。⁵²第三，SS-11 數量也高達 780 枚，若干 SS-16 以及 60 枚可攜帶 4 枚彈頭的 SS-17，蘇聯的陸基彈道導彈數量已居壓倒性優勢。最後，由於 SALT I 中未對「重型飛彈」作出明確定義，蘇聯得以見縫插針，輕鬆地讓新發展且當時性能最優越的 SS-19 通過「輕型飛彈」的標準。它比起前一世代的 SS-11 飛彈大了 50% 到 60%，投擲重量 (throw weight) 則躍升為 SS-11 的四到五倍，並且可攜帶 6 枚彈頭，不論投擲重量亦或攜帶彈頭數都是美國「義勇兵 III」型 (Minuteman III) 導彈的兩倍。SS-19 在第三代彈道導彈中獨占鰲頭成為蘇聯陸基戰略武力的主力，占其總數約一半左右。⁵³

在赫魯雪夫時期，蘇聯的核子武力若與美國比較，仍然處於下風。在戰略核三角的三個領域中，美國的優勢令蘇聯望塵莫及。但是到了布列日涅夫時期，他

⁵⁰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 together with agreed statements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s regarding the treaty*,”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uke/control/salt2/text/salt2-2.htm>.

⁵¹ Thomas Downey, “The Reagan Freeze on SALT,” *Arms Control Today* 12, 10, (Washington D. C. : Nov 1982): 1-3.

⁵² 蘇聯重型飛彈的確實數量向來就有爭議，308 枚不過是普遍接受的數目。另外，蘇聯在阿拉海 (Aral Sea) 及貝爾喀希湖 (Lake Balkhash) 間的提留拉頓 (Tyuratán) 試驗場有 18 枚 SS-9 型導彈原型。Strobe Talbott, *Endgame: Inside Story of SALT II*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pp. 253-4.

⁵³ David S. Sullivan, “A SALT Debate : Continued Soviet Deception,” *Strategic Review* 7, 3, (Washington D. C. : Fall 1979): 29-31, and Strobe Talbott, *Endgame: Inside Story of SALT II*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pp. 24-30.

優先加強戰略火箭軍的洲際彈道導彈發展，提出洲際彈道導彈隱藏式發射地窖的增建計畫。有了隱藏式導彈發射地窖之設計，陸基彈道導彈為人所詬病的機動性將有實質上的補救，增加報復能力與機率！此時洲際彈道導彈以及中程彈道導彈配備了第一代的導彈系統，目的是執行最高司令部指派的戰略任務，不管地理位置如何遙遠，在任何戰場上都能保護國家不受敵國核武攻擊的威脅。換句話說，敵方橫跨海洋的洲際核武攻擊不再無懈可擊，蘇聯隨時有能力予以反擊。⁵⁴

到了 1970 年，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數量已超越美國；除此之外，蘇聯更是積極擴充新式核子彈道導彈潛艇與潛射彈道導彈發射器的數量。上述兩項大規模的發展計畫，乃著重於 SS-9、SS-11 兩型，以及 Y 級（Yankee-class）核子彈道導彈潛艇。⁵⁵蘇聯一直引以為傲的戰略火箭軍，其代表的陸基核子武力此時已凌駕美國取得優勢（請參考表 2-2）。至於在空基戰略武力方面，1970 年代初期，蘇聯的戰略空軍開始配備七十架左右的「逆火式」（Blackfire）戰略轟炸機，還以每年約三十架的量產速度投入軍方，而停止其他各型戰略轟炸機的生產。⁵⁶

表 2-2：蘇聯極盛時期與美國在戰略核三角武力上的對比（1977-1978）

蘇方			美方		
載具型態	數目	初部署年份	載具型態	數目	初部署年份
陸基洲際彈道導彈部分					
SS-9	190	1965	Titan II	54	1962
SS-11	780	1966	Minuteman II	450	1966
SS-19	60	1968	Minuteman III	550	1970
SS-16	不詳	1978			
SS-17	60	1977			
SS-18	110	1975			
SS-19 I	200	1975			
SS-19 II		不詳			
中程彈道導彈部分					
SS-4	500	1959			
SS-5	90	1961			
SS-20	100	1977			
海基中程彈道導彈部份					
SS-1b	1300	1953	Honest John	不詳	1953

⁵⁴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⁵⁵ 金家鎮，「蘇聯的戰略武力」，*問題與研究* 22, 1, (台北：Oct 1982): 50-1。

⁵⁶ 金家鎮，「蘇聯的戰略武力」，*問題與研究* 22, 1, (台北：Oct 1982): 51。

Frog 7		1965	Pershing	108	1962
SS-1 C B		1965	Lance	36	1972
SS-12		1969			
SS-21		1978			
陸基中程巡弋飛彈部份					
SS-N-3	100	1962			
海基洲際彈道導彈部份					
SS-N-4	27	1961	Polaris A III	160	1964
SS-N-5	54	1964	Poseidon C III	496	1971
SS-N-6 I、II、III	528	1969			
SS-N-8	370	1973			
SS-NX-17	16	1978			
SS-N-18	不詳	1977			
海基中程巡弋飛彈部分					
SS-N-3	324	1962			
空基巡弋飛彈部分					
AS-3	不詳	1961	Hound Dog	400	1961
AS-4	800	1962			
AS-6	不詳	1977			
空基中程巡弋彈部分					
			SRAM	1250	1972
核子砲彈部分					
M-55	不詳	1950s	M-110	215	1962
			M-109	300	1964
長程戰略轟炸機部份					
Tu-95	100	1956	B-52 D	366	1956
Mya-4	35	1956	B-52 G/H		1959
中程轟炸機部份					
Tu-16	585	1955	FB-111 A	66	1969
Tu-26	80	1974			
陸基短程轟炸機					
I1-28	1100	1950	F-4 C/D/E	556	1962
Su-7		1959	F-111 A/E		1967
Tu-22		1962	航空母艦配備攻擊機		
Mig-21 J/K/L		1970	F-4 J/N	100	1962
Mig-27 D		1971	A-6 E		1963
Su-17/20 C		1974	A-7 E		1966
Su-19 A		1974			

資料來源：Charles Kiselyak, "Round The Prickly Pear: SALT and Survival," *Comparative Strategy* (Oxfordshire: Winter 1979): 820-1.

到戈爾巴秋夫上台前，戰略火箭軍正處於戰力最堅強、陣容最整齊的巔峰時

期，要突破美國尚未發展成熟的反彈道導彈防禦體系絕非難事！⁵⁷為蘇聯平添不少「談判籌碼」(bargaining power)。根據學者柏特 (Richard Burt) 的估計，到了 1985 年美蘇之間在陸基彈道導彈力量對比上，爆炸力蘇聯有七比一的優勢，彈頭數目則有五比一的優勢。⁵⁸蘇聯的戰略核武能力一時不可一世，對美國戰略優勢構成重大威脅。也讓美國國內鷹派勢力趁機不斷渲染，蘇聯的軍備優勢將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這樣的印象愈來愈深植於美國人的心中！

⁵⁷ Vladimir Nikolayevich Yakovlev, "The SMF's Special Miss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drsov137_s97017.htm.

⁵⁸ Richard Burt, "The Scope and Limit of SALT," *Foreign Affairs* 56, 4, (New York: Jul 1978): 760.

第三節 戈爾巴秋夫時期開始裁減軍備

本章節將研究範圍的時間點限縮在 1985 年戈爾巴秋夫上台後，至 1991 年八月政變爆發以前。闡述戈爾巴秋夫的軍事改革路線。有感於蘇聯過度挹注經濟資源於發展軍備上，導致國家經濟疲弱不振，又面臨著雷根「戰略防衛計劃」的來勢洶洶，他必須改旋易張、力挽狂瀾，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層面的轉型工作以及裁減軍備，以求挽救經濟並且尋求同美國的和解。戈爾巴秋夫背負如此不可承受之重的責任感，卻也因為他不斷推銷近乎宗教目標的理念，讓全世界的人都認得「開放」(Glasnost) 和「重建」(Perestroika) 這兩個俄文字，並且深深為其領袖風範所折服。

改革前的政治佈局：剷除羅曼諾夫與葛羅米柯

1982 年 11 月 10 日，布列日涅夫死亡。安德洛波夫接任蘇共總書記職位，但旋即於 1984 年 2 月病逝，掌權僅 15 個月；繼任的契爾年柯在位時間更短，於 1985 年 3 月去世。由於安德洛波夫及契爾年柯兩人年老且體弱多病，在位時間兩任加起來不到三年，施政上難多有建樹，僅能視為蘇聯政權轉移的過渡時期。對外政策上兩人蕭規曹隨，奉 1982 年 2 月蘇共第 26 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對外關係原則為圭臬，以「和平共存」與「國際緊張的緩和」作為基本對外方針，蘇聯的對外政策變得僵硬而毫無彈性。1981 年底，美國總統雷根曾向安德洛波夫提出關於歐洲中程飛彈的「零方案」：如果蘇聯拆除全部業已部署的 SS-20 以及「SS-5 司坎式」(Skean) 兩型導彈；美國也願意取消部署 572 枚潘興 II 號及巡航飛彈的計畫，但是卻遭到安德洛波夫堅拒。⁵⁹布列日涅夫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許多重大問題，兩位老人不但來不及解決，美蘇關係也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戈爾巴

⁵⁹ 畢英賢，「外交」，畢英賢編，*蘇聯* (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pp. 340。

秋夫只得照單全收。

改革的序曲開始於 1983 年，戈爾巴秋夫表示對蘇聯工業的落後程度憂心忡忡。⁶⁰為了順利推動經濟政治與國家安全政策上的全面轉型，戈爾巴秋夫必須進行人事上的甄補以配合他的「政治新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而人事問題戲劇性地順利過關，沒有掀起太多政治風暴。在他 1985 年春初掌政時，政治局成員先後逝世，僅僅剩下 10 名正式委員，顯然已經衰弱到不能成爲一個集體領導權力機構。一群垂垂老矣的政治局大老，對一個年僅五十四歲的蘇聯總書記來說，不論是年齡、體力亦或是活力，在執政的一開始戈爾巴秋夫就拿了一手好牌。更何況預定 1986 年 2 月召開的第廿七屆黨代表大會(the 27th CPSU Congress)也即將來臨，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迅速集結反對勢力絕非易事。⁶¹戈爾巴秋夫必須在此重大場合搶得先機，於新的施政方針上暢所欲言。

不過，戈爾巴秋夫的竄升必然樹大招風，他的改革仍有實際上的隱憂。首先是其頭號對手羅曼諾夫，他身兼政治局正式委員以及中央委員會書記，是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其次，戈爾巴秋夫與軍方毫無淵源，若軍事改革過於激進將會刺激軍方反撲。戈爾巴秋夫要怎麼做才不會觸動保守勢力最敏感的神經而又能同時推動改革呢？他決定分成兩個階段爲自己鋪路。佈局第一階段，要打破政府官僚機構中布列日涅夫夫人馬的權力，他成功地在 1985 年 3 月至 7 月間奪取了政治局的主導權。4 月 23 日，任命他自己的人馬擴充政治局，諸如中央委員會書記瑞茲科夫 (Nikolai Ryzhkov)、李加契夫 (Yegor Ligachev) 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柴布瑞柯夫 (Chebrikov) 均被任命爲政治局正式委員；而國防部長索科洛夫 (Sergei Sokolov) 元帥也成爲政治局的候補委員，以求稀釋局中保守勢力。7 月 1 日，戈爾巴秋夫終於剷除了羅曼諾夫，並且由謝瓦納澤 (Eduard A. Shevardnaze) 代替擔任蘇聯外長長達廿八年的前朝元老葛羅米柯，謝瓦納澤在此時也順理成章進入政治局，而被解職的葛羅米柯則擔任主要爲榮譽職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⁶²

⁶⁰ Bruce Parrot, *The Soviet Union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oulder: Westview Pr., 1987), pp. 55-6.

⁶¹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著，王正已譯，一九八五—八六年世界各國戰略透視 (台北：黎明文化，1988), pp. 114。

⁶² Thane Gustafson and Dawn Mann, "Gorbachev's First Year: Building Power & Authority," *Problem of Communism* 35, 3, (Washington D. C. : May-Jun 1986): 1-19, and The International

克里姆林宮氣象煥然一新，羅曼諾夫大勢已去，不可能在政治局裡進行反撲。

爲了順利推動軍事改革而大量拔擢新人

政治局佈樁完畢，接下來就是國家安全政策領域了。根據學者史考特(Harriet F. Scott)的估計，光是在1985與1986兩年內，就有15名蘇軍將領新人獲得拔擢。確鑿無疑的是軍中瀰漫著一股世代交替的氣氛。⁶³1985年7月3日，戈爾巴秋夫親自出席明斯克的一場秘密會議，與蘇軍高階將領交換意見。隔天，正式任命索科洛夫爲國防部長，接著不久又任命自己爲國防委員會主席。值得注意的是，索科洛夫當時已屆七十四高齡，難以有何作爲，戈爾巴秋夫可以順利遂行軍事改革。

佈局第二階段，從1985年9月27日將提柯諾夫總理由瑞茲科夫接替時開始，布列日涅夫時代的高官紛紛中箭落馬。提柯諾夫在10月15日失去政治局席位，莫斯科黨組織頭子葛里辛(Viktor Grishin)也在隔年2月10日失去政治局席位。而戈爾巴秋夫自己的人馬則大舉入侵政治局，例如塔里津(Nikolai Talyzin)與葉里欽(Boris Yeltsin)成爲政治局候補委員，毫無疑問他們都支持戈爾巴秋夫的改革理念。軍事系統中保守勢力也難逃一劫，首先遭殃的是任職長達卅年之久的總政治部主任，接著海軍總司令高爾希可夫海軍上將也遭到革除。據信在這一波整肅當中，已有近20位蘇聯派駐主要國家大使、實際上數千名下級官員遭受牽連。⁶⁴

之後另一個更大的機會終於來了，1987年3月28日，發生西德青年魯斯特(Matthias Rust)駕駛輕型航空器直闖莫斯科紅場的烏龍事件，固若金湯的防空軍空防體系竟無法在途中攔截。除了顯示蘇聯的空防體系虛有其表，也給了戈爾巴秋夫大好機會去整肅異己。遭殃的當然不會只有防空軍，其他軍種連帶遭受池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著，王正已譯，一九八五—八六年世界各國戰略透視(台北：黎明文化，1988)，pp. 114-5。

⁶³ Harriet F. Scott, "Red Star in Motion," *Air Force Magazine* (Arlington: Mar 1985): 58.

⁶⁴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著，王正已譯，一九八五—八六年世界各國戰略透視(台北：黎明文化，1988)，pp. 114-6。

魚之殃，首當其衝的防空軍總司令兼國防部副部長柯爾杜諾夫（A. I. Koldunov）因為嚴重失職而辭去職務。⁶⁵因而有一批新人以黑馬之姿上台，這一批新人平均年紀約在 62.9 歲左右，⁶⁶為即將啟動的軍事改革工程注入一股活力！首先，是六十四歲的雅佐夫（Dmitri T. Yazov）取代七十六高齡的索科洛夫成為國防部長。其次，五十九歲的李茲契夫（Aleksey Lizichev）取代七十九歲的亞比雪夫（Aleksei Epishev）成為海軍總司令。五十九歲的契爾拿維恩（Admiral V. Chernavin）。至於戰略火箭軍方面，從 1972 年開始擔任總司令的托路布科（Vladimir Tolubko）已屆七十高齡，戈爾巴秋夫也以當時六十一歲的馬克西莫夫（Yu. P. Maksimov）取而代之。⁶⁷戈爾巴秋夫大量拔擢青年才俊取代保守勢力，幅度這麼大的軍方人事調動，顯然是在為其全面翻新的軍事準則鋪路。而整個戈爾巴秋夫執政時期，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則是一直由馬克西莫夫擔任（1984 至 1992 年），他同樣經歷過衛國戰爭，並且兼任副國防部長。⁶⁸

停止發展軍備以挽救蘇聯經濟

在 1987 年夏季，戈爾巴秋夫應美國出版商之邀，撰寫「改革與新思維」（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一書。本書共分為俄文與英文兩種版本，書中內容也分成上、下兩篇，上篇旨在闡述國內改革層面的新思維；下篇則著眼於因應國際情勢與國際關係的轉變，蘇聯應該有關於政治、國家安全及對外政策層面的新思維，徹底顛覆舊有的準則。戈爾巴秋夫宣稱新思維「實際上涵蓋了當代所有的主要問題」⁶⁹不過，戈爾巴秋夫的軍事準則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改革與新思維中所言主張東西和解、限武談判，而是不斷地進行改變。根據他日後所撰「俄羅斯的教訓」（Gorbachev: on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

⁶⁵ Dusko, Doder & Louise, Branson 著，譚天譯，*戈巴契夫傳*（台北：聯經，1990），pp. 264。

⁶⁶ Thane Gustafson and Dawn Mann, "Gorbachev's First Year: Building Power & Authority," *Problem of Communism* 35, 3, (Washington D. C. : May-Jun 1986): 1-19.

⁶⁷ Sergei Zamascikov, "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Comparative Strategy* 7, 3, (New York: 1988): 236.

⁶⁸ 蔡昇輝，「軍事」，畢英賢主編，*蘇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pp. 507。

⁶⁹ 曹廷清、楊成竹，*蘇聯簡史*（台北：五南圖書，1993），pp. 127-9。

一書中強調，政治新思維的理念一直不停地演進。他在書中闡述新思維的演變過程可以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 1 • 第一階段—蘇共第廿七屆黨代表大會無疑是新軍事準則的起點，戈爾巴秋夫在這場會議裡所提出的立場，以及這個立場再之後一段時間的強化。本階段的特色，是對於二戰結束以來世局重大變化的理論—政治性分析，與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政治需求。第一階段的實際任務就在於尋求一種實際可行的辦法以終止冷戰，並且謀求一條出路以掙脫不信任、敵視和對抗的惡性循環。
- 2 • 第二階段—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88 年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說。此時若干國際情勢已逐漸好轉。這個階段的特色是，有關全球發展遠景的重要構想已經提出來了。東西方不再談「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談的是人類的全球性利益、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則，以及在所有國際社會成員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營造未來的迫切需求。
- 3 • 第三階段—1990 至 1991 年。這個階段具體落實了：單單只是國際關係領域的變化還不夠，若想要確實保障人類前途，唯有為文明本身建立新典範才能辦到。在世界新秩序的新典範建立過程中，一種新的文明形式將逐漸浮現。⁷⁰

由於布列日涅夫時期不斷投入資金發展軍備，在背負著沉重經濟壓力的前提下，戈爾巴秋夫首先決定自美蘇軍備競賽中全面撤退，不再追求戰略優勢。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估計，在 1967 至 1977 年間，蘇聯投入軍事方面的研究暨發展經費，約佔其國防預算的 10% 至 25%；而同時期的美國軍事研發費用卻只有佔軍事預算的 10% 至 12%。⁷¹根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資料顯示，蘇聯的國防預算包含研發費用，在 1970 至 1971 年左右已趕上美國，之後更是連年超越，成為世界上軍事預算支出最高的國家。⁷²在 1965 至 1979 年間，軍費開支增長了三倍以上，平均每年遞增 8%。其中 1970 至 75 年軍費增長近一倍，遠遠超過了蘇聯國民所得的成長率。軍費在國家預算開支中的比重越來越高，1979 年軍費開支已佔當年財政支出的 30% 以上，佔國民收入 20% 以上，佔社會總產值的 12% 到 13%，相當於全年蘇聯社會新增財富的五分之一以上。⁷³蘇聯的軍事裝備不斷推陳出新，顯示

⁷⁰ 戈巴契夫著，譚天譯，*俄羅斯的教訓*（台北：貓頭鷹，2001），pp. 265-6。

⁷¹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34.

⁷²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19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36.

⁷³ 陸南泉，「蘇聯走進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東歐中亞研究* 6（北京：Dec 2001）：68-72。

其確有決心要超越美國。布列日涅夫犧牲傳統部隊的發展，將國防資源優先投資在戰略武力上，並且建構經強化的導彈、發射地窖，佈置海基彈道導彈，發展第一代飛彈防衛系統，以加強蘇聯核武的生存力（survivability），⁷⁴提高蘇聯的報復機率與能力。

然而不可否認的，布列日涅夫時期也正是蘇聯經濟走向崩潰的起點。一味地追逐軍備競賽的優勢，蘇聯迷失了自己，勞動力下降、物資匱乏、生產效益日漸低落。在 1960 年代美國是世界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其累計軍費支出相當於蘇聯的兩倍，然而在進入 1970 年代之後換成了蘇聯，世界最龐大的軍費開支已拖垮整個國家的經濟。此時蘇聯所遭遇的經濟衰退表現在下列四個現象：

- 1 • 資金日益短缺，基礎建設投資增長速度明顯下滑。蘇聯 1950 年代的基礎建設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為 13.3%，1960 年代剩下 7.1%，1970 年代則再降到 5.3%。1970 年代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比美國及其西歐盟友至少短少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蘇聯到了 1980 年，已經把機器製造與金屬加工業將近 50% 的產品用於軍事目的上。
- 2 • 由於基礎建設投資增長速度明顯下滑，許多經濟部門已經感到勞動力不足。在 1966 至 70 年間，蘇聯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下降了 7.4%；1971 至 75 年間每年下降 6.3%，1976 至 80 年每年再下降 4.2%。而布列日涅夫面對這種情形不但置若罔聞，反而變本加厲地挹注大把大把鈔票在軍費開支上。從 1972 年開始成為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
- 3 • 由於長期實行粗放經濟發展模式，結果是原料、燃料資源耗損率大幅增長，產生蘇聯工業資源遭到嚴重浪費的情形。單位產品的物資損耗率從 1970 年的 54.9% 大幅攀升至 1980 年的 57.2%。能源的有效利用率為 43%，損失達 57%，損失的燃料經換算竟高達 9 億噸；每年因鏽蝕而失去了 2000 至 2500 萬噸金屬；穀物每年浪費 3500 至 4000 萬噸；每年木材開採量雖高達 3 億立方公尺，但是在運輸、加工過程中卻無情地耗費掉一半。
- 4 • 人民收入續縮水。在 1971 至 75 年間，人民的收入平均每年下降 5.7%，1976 至 80 年間每年下降 4.3%；到了 1982、83 年布列日涅夫辭世前夕，每年仍然繼續下滑 2.6%。軍備競賽耗盡國庫，人民生活水平與日俱減，坐困愁城、苦不堪言。⁷⁵

加上國際上蘇聯處處煽風點火，特別是 1979 年 12 月 25 日，蘇聯軍隊大舉入侵阿富汗，換來的並非是光榮的迅速勝利與錦上添花的衛星國，而是軍事與外

⁷⁴ Roger E. Kanet, "The Soviet Union as a Global Power,"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p. 7.

⁷⁵ 陸南泉，「蘇聯走進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東歐中亞研究* 6 (北京：Dec 2001): 68-72。

交上的重大挫敗以及長達十年的戰爭泥沼，每年損耗軍費竟高達 50 億盧布。⁷⁶過度擴軍損傷經濟的效應在此浮現，蘇聯的軍事費用一直居高不下，超出國家經濟胃納。長期以來爲了維持蘇聯的全球性霸權地位，而不斷援助共產集團盟友、鼓動第三世界革命、進行「代理人戰爭」以及阿富汗戰事不利、油價持續下跌、蘇中交惡等等，終於導致蘇聯經濟不勝負荷，開始呈現停滯。到了 1990 年代前夕，蘇聯財政已嚴重吃緊，此時唯有削減國防預算方能度過危機。裁減軍備、全力發展經濟迫在眉睫。可惜，戈爾巴秋夫的改革最後遭到保守勢力極力反撲，發動「八月政變」，粉碎了他的改革大夢，令人不勝唏噓。

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人類相互依存，推動無核世界

至於在國際政治上，美國對蘇聯的敵意此時也達到最高峰。1980 年選出的新任美國總統雷根具有強硬的反共立場，早在總統大選期間，就高聲指責卡特政府的洲際飛彈與國防政策爲「易毀的窗口」(Window of Vulnerability)，並主張及早部署「MX 飛彈」。當時美國朝野一致認爲蘇聯將在 1980 年代初中期，倚靠其龐大核武優勢向全世界發動外交、政治，乃至於軍事攻勢。過度的悲觀想法使得此啓示錄式的預測成爲 1980 年代初期美國所面臨「最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1979 年 4 月，美國戰略空軍總司令艾里斯 (R. H. Ellis) 致函國防部長，稱美國洲際飛彈掩體的生存能力正日益下滑，「現在已低於百分之四十」；1980 年若干官員證實，1980 年代初期蘇聯的一次攻擊在理論上可摧毀 90% 以上的美國洲際彈道導彈。⁷⁷種種臆測及憂慮成了日後雷根執政除強硬對外路線別無選擇的主因。雷根上台後，美國國內對 MX 飛彈的效用爭論正方興未艾，雷根選擇在 1983 年 3 月 23 日的電視演說中，說出了一段出人意表的話，顛覆大家強調報復能力的固有思維：

拯救生命不是比進行報復、傷害生命更好嗎？...在和我的顧問們，包括聯合參謀本部商談後，我相信的確有一個辦法，今天就讓我與大家分享一個

⁷⁶ 尹慶耀，「蘇聯的軍事改革」，*問題與研究* 30, 1, (台北：Jan 1991): 49。

⁷⁷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編，程竑譯，*1980—1981 世界各國戰略透視* (台北：黎明文化，1982), pp. 29。

關於未來的構想。這個構想就是我們正在著手進行一項防禦的手段，來抵擋蘇聯可怕的飛彈威脅計畫。要是自由世界的人們能安全地過著生活，知道他們的安全不是仰賴能嚇阻蘇聯的我國立即報復能力，而是我們能夠在戰略彈道導彈到達我國或盟邦的領土之前，就能預先攔截並且摧毀之，那該有多好！我呼籲我們的科學界能夠把才能轉移到這個攸關世界和平的大業上，而能發明出讓核子武器無用與過時的方法。⁷⁸

雷根不再以傳統斤斤計較第一擊、第二擊能力的概念鋪陳其軍事準則，轉而以截取飛行中的洲際彈道導彈，來防止當時羽翼豐滿的蘇聯發動奇襲之新概念做為戰略上的新佈局思考。他提出了一套防止核襲擊之戰略防禦系統概念，也就是「戰略防衛計畫」(SDI)，又稱為「星戰計畫」(Star Wars)。此計畫包含了當時還未能完全發展起來的太空基地與地球基地之雷射作戰站等技術。戰略防衛計畫的空中計畫部分還因沿用當年流行電影「星際大戰」(Star Wars)的名字而被戲稱為「星戰計畫」。雖然該計畫在國會通過後，激起了美國輿論兩極化的激烈爭論，並遭到廣泛批評，被認為是不可行的。甚至有不少軍事專家譴責該計畫勢將激化軍備競賽以及破壞武器限制的進程；⁷⁹不過支持者卻認為一旦技術上有所突破，這計畫勢將核戰威脅風險降至最低，嚇阻蘇聯的侵略行為。雖然戰略防衛計畫在1999年宣告放棄，但是的確曾讓蘇聯領導人感受到不小威脅。

學者查卡里爾(Fareed Zakaria)認為，戰略防衛計畫無庸置疑產生對美國有利的政治槓桿(political leverage)作用，⁸⁰目的是改變美蘇間戰略平衡現況，爭取國際戰略優勢。⁸¹因為戰略防衛計畫是美國新一波軍事科技攻勢，足以讓戈爾巴秋夫一籌莫展，他深知蘇聯的科技實力與經濟後盾遠不如美國，如果硬著頭皮急起直追，最後必將一如喬治·肯楠(George Frost Kennan)在「圍堵理論」(containment policy)中所預言的，挹注過多資源的軍備競賽拖垮整個蘇聯社會，而讓西方陣營坐享其成；若置之不理(事實上當時百廢待興的國內重建與改革工作，已不容許戈爾巴秋夫冒進)，則戰略優勢必逐漸向美國傾斜，美國也可

⁷⁸ Michael Mandelbaum and Strobe Talbott, *Reagan and Gorbachev*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7), pp. 123-4.

⁷⁹ 「戰略防衛計畫」，大英簡明百科知識庫，<http://wordpedia.britannica.com/concise/content.aspx?id=15352&hash=QTJddS%2bCrPcm3vzTzejwKg%3d%3d&t=2>。

⁸⁰ Fareed Zakaria, "The Reagan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 3, (New York: Fall 1990): 386.

⁸¹ 畢英賢，「外交」，畢英賢編，*蘇聯* (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pp. 340。

藉機換取蘇聯在軍事、政治或外交上的讓步。可見星戰計畫並非一項單純的軍事建設，而是另一個軍事政治工具，具有高度的政治影響力。

顯而易見地，1976年至1977年的發展趨勢充分證明，一味地發展核武結果適得其反。光有純軍事科技的突飛猛進，卻忽略政治層面的深層考量，只會反而使蘇聯飽受核彈攻擊威脅。⁸²當然，戈爾巴秋夫不會坦白承認他對於星戰計畫的恐懼，而是包裝在防範爆發核子大戰對於人類生存的戕害裡。他在所撰的「俄羅斯的教訓」一書中曾回憶當時，核子大戰的危險在1980年代中期已然成爲一種政治現實。世界各國正處於一種尷尬的僵局，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走出這個僵局，東西方的僵局恐怕會永遠持續下去。書中他語重心長地指出：

蘇聯和美國不斷地彼此「監視著」，所有東、西方陣營的國家也都相互瞪視著。核子和傳統武器的累積與不斷強化，已經成爲現代世界生活的一種習以爲常、而且似乎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歐洲已經成爲核子武器競賽的競技場。各種射程、各種爆炸威力的飛彈不斷駐進歐洲，它們的數量逐年、事實上是逐月增加。全球各處海洋星羅棋布著載有飛彈的艦艇，包括海面上艦艇與潛艇。連外太空也淪爲這種對抗僵局的一部分。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區域性衝突繼續在狂暴地進行。⁸³

同時，阿富汗戰爭不僅造成蘇聯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大壞，連辛苦經營的東西方關係和解也毀於一旦，西方陣營猛烈抨擊蘇聯的侵略舉動。蘇聯也因爲這一場不正義的戰爭，國際形象大幅滑落，新上任的戈爾巴秋夫首先就要改變對外政策，扭轉世人對於蘇聯的刻板印象。高聲疾呼「合理的充分性」、「無核世界」、「防禦性國防」等近乎宗教理想的口號爭取對外政策上的道德性。

戈爾巴秋夫一直對外界強調「我們—全人類—正處在同一艘船上，而且我們只能一起浮或沉。」⁸⁴世界各國必須相互依存、不可能自掃門前雪的理想號召深獲好評。不論美國此時是靜觀其變還是真心相信，戈爾巴秋夫已經讓蘇聯在國際社會中取得了道德性與友誼，越來越多國家的領導人信任並引頸期盼戈爾巴秋夫及其改革。美國內部的鷹派很難再將之妖魔化(demonize)，國際緊張局勢因而緩

⁸² Ross Babbage, *The Soviets in the Pacific in the 1990s* (Australia: Pergamon Press, 1989), pp. 31.

⁸³ 戈巴契夫著，譚天譯，*俄羅斯的教訓* (台北：貓頭鷹，2001)，pp. 243。

⁸⁴ Mikhail S.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U. K. :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87), pp. 147.

和下來。蘇聯國內外尚待解決的問題不可勝數，甚至可以用千瘡百孔來形容。裁減軍備不僅可以挹注資源在經濟問題上，同時也是爭取國際認同最快的路！

片面裁減軍備：合理的充分性

其實，戈爾巴秋夫早期的說法與後來政治新思維前後矛盾，只是他並沒有在書面文件中坦承罷了。根據戈爾巴秋夫在 1985 年以前的一些聲明指出，早期的他一直是布列日涅夫戰略的堅定擁護者，主張擴大軍事力量，提高蘇聯自身的安全。在 1985 年 3 月戈爾巴秋夫甫上台時，他於蘇共中央臨時全會中，強調蘇聯要將防衛能力維持在下述這樣一個程度上：讓潛在的侵略者明白地知道，若貿然侵犯蘇聯人民的和平生活，必將遭致毀滅性的報復攻擊。不過，在此戈爾巴秋夫同時也宣稱蘇聯「不追求單方面的優勢」。到了 4 月的中央全會，戈爾巴秋夫還聲稱「戰略均衡」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成果，並且是維持和平與抑制侵略野心的必須因素。⁸⁵究竟是當時人微言輕，所以才說出言不由衷的政治語言；還是當政後有感局勢對蘇聯不利，頓時領悟才大幅度修正準則，原因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吧！同年 5 月，戈爾巴秋夫破天荒地公開當年的軍事預算是 773 億盧布。若是仔細評估當時蘇聯全年預算與經濟窘境，就可得知蘇聯若欲發動大規模戰爭已難如登天。⁸⁶

戈爾巴秋夫在國家安全概念上的「改造」，其中心點就是「合理的充分性」（Reasonable Sufficiency）的防衛理念。一改過去布列日涅夫時期「超略均衡戰略」的擴張性理念，他徹底改造軍事準則的意識形態，主張未來蘇聯只需要一支能力足以保衛祖國，卻又對其他國家不構成威脅的軍隊。也就是說，蘇聯的戰略應以防衛為傾向，在合理而充分的軍事力量下，確保國土與主權免於遭受破壞。武裝部隊則應朝向經濟、精簡而精銳的方向邁進，「重要的不是從事全面戰爭的能力，而僅是保衛國家安全所需要的能力。」⁸⁷在 1987 年 5 月，戈爾巴秋夫於

⁸⁵ 宮內邦子，「戈巴契夫政權的新軍事政策」，*國防* (Japan: Jun 1988): 95-102, 引自尹慶耀，「蘇聯的軍事改革」，*問題與研究* 30, 1, (台北：Jan 1991): 50-2。

⁸⁶ 鄭承中，「蘇聯首次公開軍事預算之實況」，*蘇聯問題研究* 31, 1, (台北：Jan 1990): 7。

⁸⁷ Geoffrey Ponton, *the Soviet Era: Soviet Politics from Lenin to Yeltsin* (Cambridge: Blackwell

華約組織高峰會上正式公佈新軍事準則的基本精神：

- 1 • 如果未遭受攻擊，絕對不對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採取軍事行動。
- 2 • 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No First Use）。
- 3 • 不對任何國家有領土要求。
- 4 • 不視任何國家、任何個人為敵人。
- 5 • 維持最低水平的軍事力量，以足夠擊退任何外來侵略為基準。
- 6 • 維持戰略武力以防奇襲。
- 7 • 武裝力量絕不超過實際需求。⁸⁸

1987 年 12 月 8 至 10 日，戈爾巴秋夫與雷根在華盛頓高峰會中，簽署「美蘇關於銷毀中程暨較近程導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以下簡稱『中程核約』），規定美蘇須在三年內撤除並銷毀所有射程在 500 至 5500 公里之內的核子飛彈。本條約的真正效益其實微不足道，但卻是象徵著人類邁向無核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因為該約促成人類第一次「完全銷毀」而非僅限制某一種類型的核子武器，即所謂的「全球雙零方案」。不過，實際上該類型的核子武器只佔兩國全部核子武力的 5% 左右，無足輕重。而美蘇關係也從中程核約開始逐漸解凍，因為條約中允許對方派觀察員進入本國境內，進行實地查證工作，這需要一定程度的互信。至於雙方最執著的戰略武力方面，仍然難以達成妥協。⁸⁹

早在 1986 年戈爾巴秋夫訪問印度時，他儼然就以一位傳道士自居，積極傳揚建立一個無核、無暴力世界的宗教式福音，並且簽訂了聞名遐邇的「德里宣言」。宣言中的第六項是把用於軍備之資源，改運用在確保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上；第九項則是以國際安全取代恐怖平衡。⁹⁰後來戈爾巴秋夫更是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揭露了三個具體建議：

- 1 • 進攻性戰略武器。蘇聯準備在第一個五年期間把這種武器削減 50%。蘇方盼望在戰略核三角的戰略武器結構上—陸基彈道導彈、海基潛射導彈以及戰略轟炸機，蘇美雙方能將各個部分削減一半。
- 2 • 中程飛彈。建議完全銷毀雙方部署在歐洲的中程導彈。同時蘇方同意凍結射程在 1000 公里以下的導彈，並就其處置辦法進行談判；也願意接受美方建議，嚴格限制部署在蘇聯亞洲領土的中程導彈數量，在烏拉以

Publishers, 1994), pp. 156.

⁸⁸ 畢英賢，*新蘇聯：社會主義祖國在蛻變中*（台北：時報文化，1991），pp. 31。

⁸⁹ 外交部亞西司編印，*蘇聯內政與對外關係* 501，（台北：Aug 1989）：12。

⁹⁰ 畢英賢，「蘇聯的新政治思維與對外政策」，*問題與研究* 27, 2,（台北：Nov 1987）：23-4。

東僅保留 100 枚中程導彈彈頭。

3. 嚴格執行關於反彈道導彈條約和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內容。建議雙方在 10 年內不行使退出彈道飛彈防禦條約的權利，並建議在裁減軍備的過程中要具體保證雙方安全，不允許某一方透過發展太空武器系統來增加軍事優勢。⁹¹

很顯然地,戈爾巴秋夫在開始單方面裁減軍備的同時，也希望盡快與美國政府展開各項裁減軍備談判(請參考表 2-3)，將國際戰略局勢就此凍結，美蘇戰略差距不會再拉開距離。例如上述第三項建議根本就是衝著美國的戰略防衛計劃而來。

表 2-3：戈爾巴秋夫任內的五次美蘇高峰會

時間	地點	美國總統	高峰會主題與結論
1985.11.19-20	瑞士 日內瓦	雷根	主題：安全問題、區域衝突、雙邊問題以及人權問題；結論：簽署「北太平洋航空安全協定」、「文化交流協定」、互設領事館、公告「美蘇聯合聲明」。
1986.10.11-12	冰島 雷克雅維克	雷根	戈爾巴秋夫提出三大主題的「一整套重大建議」，但因美國堅持不放棄星戰計劃，導致談判破裂。
1987.12.8-10	美國 華盛頓	雷根	主題：裁軍問題、雙邊關係、人權問題以及區域衝突；結論：簽署「美蘇關於銷毀中程與較近程飛彈條約」(簡稱「中程核約」)，但其他議題仍看法分歧、未有突破。
1988.5.29-6.2	蘇聯 莫斯科	雷根	主題：人權問題、區域衝突、裁軍問題以及雙邊關係；結論：中程核約正式換文。
1989.12.2-3	馬爾他	布希	雙方分別提出若干建議，作為日後改善雙方關係的參考，但無具體協定。 雙方預定於 1990 年 6 月再舉行一次高峰會。

資料來源：畢英賢，「美蘇華盛頓高峰會議」，*問題與研究* 27, 4, (台北：Jan 1988): 11-22，以及畢英賢，「美蘇莫斯科高峰會議」，*問題與研究* 27, 10, (台北：Jul 1988): 1-10。

結語

沒有二次戰後美蘇冷戰對峙的特殊時空背景，就不可能會有蘇聯陸基戰略武力的單獨成軍，也就是戰略火箭軍獨挑大樑。換句話說，這支軍種是在特殊的時間點，配合特殊的科技條件才能成功進駐如此特殊的戰略位置。蘇聯在陸基與海基戰略武力之「數量」上略勝一籌；美國則在核子武力的「品質」上遙遙領先。

⁹¹ 戈爾巴喬夫著，岑鼎山、何宏江譯，*改革與新思維* (香港：民主大學，1990), pp. 266-8。

蘇聯憑藉著該軍種已達成嚇阻均衡的必要條件。然而，過度挹注資源於軍事領域，結果卻是適得其反，沒有佔據國際戰略上的絕對優勢反而讓國家經濟瀕臨崩潰！而關於戰略火箭軍的發展歷史，1985 年到 1991 年之間可以劃為第四階段，該軍種在此時可以說是處於地位尷尬、前景不明的狀態。